

■史海钩沉

古人在“冬至”这天都干啥？

dong
冬
zhi
至黄经
270°
时
为
冬
至

12月22日是传统的冬至节气，与其他节气不同的是，旧时，冬至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当做一个节日，尤其会受到官方的重视。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介绍，由于历法原因，人们最初过冬至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到来，“周代就有了祭祀活动。古代皇帝还会在这天举行祭天典礼。官府则会举行‘贺冬’仪式”。

溯源：

冬至到来意味阳气渐长

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。顾名思义，“冬至”即意味着冬天真正来临。“小雪封地，大雪封河，冬至进九”，这句民谚形象的说明了冬至以后，天气的变化情况。中国古人则将冬至分为三候：“一候蚯蚓结；二候麋角解；三候水泉动。”

“冬至是先民在观察天时方面最早的一个发现。”高巍介绍，由于冬至白昼达到极短值、昼夜温差大，人们以此为依据确定了二十四节气的纵轴，进而确立春分秋分。并产生了很多与

农事活动有关的谚语、诗词。

同时，高巍介绍，人们还把对天象、节气的认识上升到哲学层面，“古人认为，在冬至这天，阳气开始上升，阴阳关系的反应很突出，因此有了‘冬至大如年’的说法”。

如高巍所说，古代，周历的正月为夏历的十一月，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后，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，“所以那时‘拜岁’和‘贺冬’没有太大区别”。

“古人认为自冬至起，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，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，是大吉之日。因此，后来一般春节期间的祭祖、家庭聚餐等习俗，也往往出现在冬至。”高巍表示。

仪式：

周代已有祭祀活动皇帝举行祭天典礼

或许正是因为冬至的重要性，古人将其视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气。高巍介绍，过去尤其在宫廷之中，对冬至比较重视，从周代起即有祭祀活动。

最初，人们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。《汉书》中即有“冬至阳气起，君道长，故贺”的记载。高巍介绍，汉代称冬至为冬节，在这一天要举行皇帝祭天的盛大典礼。

“当时，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‘贺冬’，官方例行放假，流行互贺的‘拜

冬’礼俗。”高巍介绍道，放假也是为了便于准备祭天，“比如皇帝，在头天晚上还必须沐浴更衣，以示郑重”。

到了魏晋六朝，冬至愈加受到重视；宋朝以后，冬至则逐渐成为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节庆活动。至于明清，皇帝仍然会举行祭天大典，谓之“冬至郊天”。宫内有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的仪式，而且还要互相祝贺；民间也有应时应景的活动。

“当然，过去是农耕社会，对天时十分重视。冬至的种种习俗，都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，衣食充足。”高巍笑称。

摘自中新网

“错位”成就的奇迹

喜好文学者都知道徐志摩，学法的人也无不熟悉吴经熊。一位是近代文化史上才华横溢的诗歌天才，一位则是学贯中西的法学大家，但少有人知道，一百年前，诗人和法学家曾是沪江校园的一对结拜兄弟；也少有人知道徐志摩曾经挚爱法律，而吴经熊一度醉心科学。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总是在阴差阳错中走向违背初衷的羊肠小道，但是柳暗花明之后，却在不经意之间创造出一桩又一桩令人欣喜的奇迹。

徐志摩和吴经熊皆为浙江人，前者生于海宁，后者生于鄞县（今宁波市鄞州区）。1916年，17岁的吴经熊考入沪江大学，与19岁的徐志摩成为同窗，加上互为老乡，两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上海相识、相知并结拜为兄弟。早在以理科为专长的宁波效实中学学习时，吴经熊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吴经熊梦想成为科学家，认为“一吨的耐心和自制，加上一盎司的想象力和逻辑推理，便构成一项科学发现或发明”。

可是当在一次化学实验发生爆炸后，幸免于难的他开始思索自己到底是否适合继续从事科学研究。而“在二十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”的徐志摩，此刻萌生了学习法律之意。当吴经熊在考虑人生前程时，徐志摩告诉他他自己要去北洋大学研习法律并邀请其一同前往。吴经熊认为“法律是社

会的科学，正如科学是自然的法律”，随即同意。两人一同参加了北洋大学在上海举行的入学考试并于1916年冬天北上天津。

在被后世称为“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法律教育机构”的北洋大学法科学习期间，两人共同修学了《法学纲要》等课程。徐志摩当时无比崇拜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，并称“最高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”，成为伟大的立宪主义者和经济学家，为了明志，遂取了“Hamilton”作为自己的西洋名。而吴经熊因“当时崇拜的英雄太多，做起选择来举棋不定”，遂选了听起来像“经熊”的“John”作为自己的英文名。

在吴经熊和徐志摩入学不到半年，北洋法科即并入北京大学。徐志摩便转到了北大继续攻读法科，其间经原配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勱介绍，拜入梁启超门下为徒，由此也开启了他与林徽因、梁思成之间的传奇故事。吴经熊则因为新



婚不久、不愿离家太远，转入同样名声斐然的东吴大学法科学习。

其后，徐志摩于1918年离开北大赴美留学，以“Hamilton”为名完成了《中国妇女地位》的硕士论文，并以此名与英国哲学家罗素互通书信。在与罗素及其他名人的交往中，徐志摩逐渐发觉一直学习的法学与经济学并非自己真正所爱，逐渐走上诗歌创作之路。而吴经熊在1920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，其间在《密歇根法律评论》上发表了《中国古代法典与其他中国法律及法律思想资料辑录》，并得到了当时极负盛名的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的赏识，两人结为忘年交。吴经熊后获得国际和平卡勒基金，到巴黎大学及柏林大学留学，并与庞德、施塔姆勒等法学名家之间展开了多场交锋和交流，“JohnWu”一度成为超越东西方，横跨法学、宗教、哲学等领域的响当当的名字。

徐志摩和吴经熊虽先后就读于美国大学，或许因为信息闭塞，当时二人并没有来往。分别留学欧洲时，两位多年未见的结拜兄弟终于聚在了一起。1920年，徐志摩曾暂住于吴经熊位于柏林的家中躲避张幼仪，后在吴经熊和金岳霖见证下，徐与张签署了离婚协议，为此，吴经熊曾当场痛骂徐志摩“瘪三”。

如果徐志摩一直研读法律，或许他真能成为中国的“汉密尔顿”，在近代中国法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虽然如此，他所创立的“新月派”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，“中国雪莱”的绝美篇章至今仍令人心动容。而如果吴经熊在沪江大学潜心钻研科学，就再也不能为我们献上如此精彩的法学思想。诗人与法学家的友谊互相成就了彼此，也成就了近代史上诗歌与法学界的两座丰碑。

摘自《检察日报》